

指引新时代中国经济航船行稳致远的思想宝库

——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

谢子轶

二、“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新时代经济发展的根本保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很多特点和特征,但最本质的特征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习近平总书记在文选中深刻指出,“党是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经济工作是中心工作,党的领导当然要在中心工作中得到充分体现。”

《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用大量篇幅系统阐述了加强党对经济工作全面领导的极端重要性。做好经济工作,必须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是做好一切经济工作的“定盘星”和“压舱石”。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正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才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四、“构建新发展格局”: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战略抉择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习近平总书记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审时度势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文选中的《关于构建新发展格局》等著作,深刻阐明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意义、科学内涵和实践路径。构建新发展格局是适应我国发展新阶段要求、塑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必然选择。其关键在于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构建新发展格局,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而是实行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中国将坚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成功举办,就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体现了中国支持多边贸易体制、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一贯立场。

三、“新的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指引

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五大发展理念,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深刻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的基础上提出的,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

《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中,《以新的发展理念引领发展》等重要篇目,对新发展理念的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进行了系统阐述。创新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动力问题;协调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绿色发展注重的是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开放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共享发展注重的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

在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上,习近平总书记旗帜鲜明地指出,“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确立的一项大政方针”。他多次强调“两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

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他亲切地称“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极大地鼓舞了民营经济发展的信心和活力。

六、“新质生产力”:开辟高质量发展新境界的核心引擎

“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而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生产力发展规律的深刻洞察和理论概括。

文选收录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他深刻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其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要以科技创新催生新发展动能,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支撑。

结语:指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科学指南

《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博大精深、内涵丰富,系统回答了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保证、根本立场、指导原则、战略选择、强大动力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构成了一个系统完备、逻辑严密、内在统一的科学思想体系。

这部著作,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为我们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经济工作提供了行动纲领,也为世界破解发展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学习《习近平经济文选》,重在学以致用、知行合一。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经济思想,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坚定信心、开拓奋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作者单位:市委党校)

学习《论持久战》思维方法 践行“七大思维”

律颖

《论持久战》是毛泽东同志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的讲演,后经毛泽东同志审定后广为传播。全文约5万字,共21个部分,120节。《论持久战》是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中国化的光辉典范,是指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伟大胜利的战略纲领,这一著作通篇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抗日战争,深刻揭示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科学预见了战争的三个阶段,为中国人民夺取抗日战争胜利廓清了认知迷雾,极大地增强了全国军民坚持抗战取最后胜利的信心和决心。

尽管《论持久战》的内容是针对战争问题进行讨论的,但其出神入化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以及总揽全局、纵横捭阖、纵论古今的恢弘气势和充满智慧的逻辑构建,深深吸引着探寻事物发展规律、寻求制胜法宝的各方人士的注目,其影响已远远超越军事领域。

《论持久战》是一篇极具历史魅力和时代价值的经典之作。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论持久战》发表87周年。87年来,虽时势发生巨大变化,但该著作所蕴含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新时代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仍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抗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上甘岭”。历史从不重复,但总是压着同样的韵脚。科学的思想方法是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总钥匙”。今天,重温《论持久战》,不仅因为它为我们提供了行动纲领,也为世界破解发展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学习《习近平经济文选》,重在学以致用、知行合一。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经济思想,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坚定信心、开拓奋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作者单位:淮北职业技术学院)

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这就要求灵活运用科学的思想方法,主动识变应变求变,主动防范化解风险,不断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

坚持系统思维,要求我们统筹国内外两个大局和坚持全国一盘棋,善于进行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坚持战略思维,要求我们高瞻远瞩,统揽全局,善于把握事物整体趋势和方向;坚持历史思维,要求我们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发挥历史主动性,善于抓住历史变革时机,顺势而为,奋发有为;坚持辩证思维,要求我们承认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善于抓住关键、找准重点,洞悉事物发展规律;坚持创新思维,要求我们破除迷信、超越过时的陈规,善于因时制宜、知难而进,开拓创新;

坚持法治思维,要求我们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公平正义,善于运用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坚持底线思维,要求我们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善于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这“七大思维”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应有之义,是毛泽东思想包括《论持久战》等一系列著作中蕴藏的智慧精华,是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察二十世纪中国与世界之时代特征和演变之趋势而提炼的具有原创性的治国理政实践智慧,是二十世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

“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掌握“七大思维”,践行“七大思维”,并努力从理论自信与实践自觉上去总结提炼好坚持“七大思维”的实践运用成果,必将为我们党锻炼出更加系统完备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延伸出坚实宽广而富有成效的路径。

这,也许是《论持久战》的当代价值和留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作者单位:淮北职业技术学院)

安徽传统廉政文化的当代价值

胡振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科学运用我国古代历史智慧推进反腐倡廉建设。他指出:“研究我国反腐倡廉历史,了解我国古代廉政文化,考察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成敗得失,可以给人以深刻启迪,有利于我们运用历史智慧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安徽传统廉政文化源远流长,从春秋《管子》“廉维论”的创造,到西汉《淮南子》“不以奢为乐,不以廉为悲”的廉政观;从包拯秉公执法千古流芳,到吕本中“清、慎、勤”的中国最早“清官”理论;从明太祖朱元璋严刑峻法惩治贪墨,到清代张英让墙三尺不滥施权,安徽传统廉政文化呈现出内涵丰富、理论独创、人物杰出、行之有效的特点。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的背景下,充分吸收借鉴安徽传统廉政文化的精华,对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实行廉政要加强价值观建设,营造廉洁社会风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安徽传统廉政文化中加强全社会廉政价值观建设的思想,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廉洁社会风尚,提供了历史滋养。《管子》“廉维论”把“廉”视为国家赖以生存的四维之一,进而在全社会推广“廉”的价值观。对于君主而言,《管子》提出

“礼义廉耻不立,人君无以自守也”的为政思路;对于大臣而言,《管子》提出“近君为拂,远君为辅,义以与交,廉以与处”的立身要求;对于民众而言,《管子》提出“民无廉耻,而求百姓之安难”的安居前提。这一廉政建设思路被《淮南子》所继承,《淮南子》廉政理论也体现出现出君廉、吏廉与民廉的三重维度。其中,君廉是核心,《淮南子》提出,人主“故禁胜于身,则令行于民”,可见最高管理者在廉政建设中的核心表率作用。吏廉是关键,各级官吏担负着廉政政令的贯彻与执行,而百姓对一朝政治廉明与否的判断,主要源自对各级官吏特别是地方基层官吏廉政表现。正如朱元璋告诫官吏说:“代天理物者,君也。代君养民者,守令也。”民廉是廉政建设的基石,《淮南子》有云:“民无廉耻,不可治也;非修礼义,廉耻不立。民不知礼义,法弗能正也。”可见民众对廉政的认可与追求,是国家廉政建设取得成效的基础。要在全社会营造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社会风尚,逐步铲除滋生贪腐的土壤,努力形成全社会联动的反腐倡廉的社会氛围。从某种意义上说,反腐倡廉不仅是政治任务,也是推进文化领域意识形态建设的必要举措,且后者更具有根本性。只有人民认同廉,倡导廉,反对贪,揭露贪,打一场反腐败的人民战争,廉政建设才能从根本上

取得胜利。这其中最关键是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能够以身作则,打铁还需自身硬。

(二)实行廉政要加强制度建设,推进国家法治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古代法制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智慧和资源,中华法系在世界几大法系中独树一帜。要注重研究我国古代法制传统和成敗得失,挖掘和传承中华法律精华,汲取营养,择善而用。”安徽传统廉政文化中的法制思想与依法治国的内涵要求是相通的,可以为国家法治建设提供宝贵的历史经验。《管子》说:“故君法则主位安,臣法则货赂止,而民无奸。”意思是说人君守法,则社稷安定;臣子守法,则贿不行。通过强调法制,《管子》为廉政建设筑起一道保护墙。《淮南子》说:“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旨准绳也。”法律是管理者制定,而管理者更应自觉带头遵循法律。突出法制思想,是安徽传统廉政文化的精华之一。然而传统政治中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力很容易突破廉政制度的束缚。明朝建国之初即建章立法,重典治贪,朱元璋在《大明律》的基础上加重科罪,将律外重刑的案例汇编成《大诰》。《大诰》共有236条目,其中惩治官吏枉法的就有150余条,法不可谓不严。但在专制政体之下,明朝中后期又是历史上吏治最腐败的时

期之一,传统政治终究避不开腐败轮回的宿命。这也从反面警示我们贯彻法治思维、保持法制稳定性,要警惕各类特权思想左右下的特权行为对法律的突破与僭越,坚决把权力装在制度的笼子里。

(三)实行廉政要加强官德教育,做到德治法并重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成功经验和深刻教训,把依法治国确定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把依法执政确定为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条道路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官德是古代官员在为政时应遵守的行为准则与规范,具有自律性,引导官员自觉追求高尚的情操与气节,从灵魂深处约束官员勤廉从政。《管子》说:“道生德,德生正,正生事。”根源于道的德,促使人们公正无私品格的形成,有德后,方可授之国政。这样个人品格的德,就外化成从政之官德。不过《管子》德的培养是外向的,所谓“仁义礼乐者,皆出于法”,通过外在约束来形成廉政品德。而培养官德,首要在于知俭。《管子》中“明主有六务四禁”,其中第一务就是“节俭”,管理者节俭,才能减少对下层民众的苛求,才能少扰民。俭以养

廉,成为传统政治中反腐的首要官德要求。宋代政治思想家吕本中在其论著《官箴》中提出“清慎勤”的廉政新概念:“当官三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指出从政必清正廉洁,为人切记审慎三思,办差始终勤勉尽职。吕氏围绕“清慎勤”三事辨析官员品格、行为、思想,构成了中国最早清官理论。当前,汲取安徽传统廉政文化中官德教育的精华,把法治建设和德治建设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实现法律与道德的相得益彰、法治与德治的相辅相成,能够不断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和治理水平。

(四)实行廉政要加强家风建设,推动社会风清气正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安徽传统廉政文化就包含着丰富的家风思想内容,如廉政家风的典型代表——包氏家风。包拯以自身的道德品质,树立了以“孝廉”为核心的家风家教,影响着包家数代人。包拯曾在他的奏章《求外任》中这样描述自己:“生于草茅,早从宦学,尽信前书之载,窃慕古人之为。”虽然包拯的祖父包世通在务农,但他的父亲包令仪自幼刻苦读书,考中进士后曾任惠安知县。包拯从小耳濡目染,勤奋好学,深受中国

传统文化的浸染,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人生态度和行为规范。因此,包拯良好品性与其家庭教育以及家风密不可分。包拯一生为官清廉,两袖清风,《仁宗实录·包拯附传》赞他:“居家俭约,衣服、器用、饮食,虽贵,如初官时”。包拯对后代要求十分严格,为了将廉俭之风传给后代,他将家风提炼成文字,“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归本家;亡没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这则家训是包家后代为官者行为规范的“底线”。在包拯良好家风的熏陶下,严格家训的要求下,包拯祖孙三代勤俭自律,守住清贫,并深受百姓的爱戴。从近年来查处的腐败案件来看,家风败坏往往是导致领导干部走向违法乱纪的重要原因。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传统家风家训的讲话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安徽历史廉吏的家风文化,在培育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良好家风,推动社会风清气正方面可以发挥独特的作用。

安徽传统廉政文化经历沧桑岁月,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需要大力挖掘和深入研究,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在新时代,我们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将安徽传统廉政文化发扬光大,为全面建设现代化美好安徽提供强大精神力量。

(作者单位:市委党校)